

我是在同住在一起的年轻人叶夫列伊诺夫的鼓励下走上大学之路的。就是这样，我来到喀山大学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

他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一个长着女人般温柔眼睛的美男子。他同我一起住在一间阁楼里。我手中常拿着书，引起了他的注意，我们便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开始说我具有“研究科学的特殊才能”。

“您天生就是搞科学的材料。”他潇洒地甩动着浓密的长发说。

当时我还不明白，认为谁都能为科学服务。可是叶夫列伊诺夫那么出色地向我证明：这些大学正需要我这样的小伙子。叶夫列伊诺夫让我到喀山就住在他

家，秋天完成中学课程，再通过“随便”几场考试，到大学里就会给我一份公家发的助学金，而可能再过5年我就会成为“学者”了，这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简单和顺其自然。

叶夫列伊诺夫才19岁，而且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考完试以后，就离开了，大约又过两个礼拜，我也随后找他去了。

外祖母送我时，告诫我说：

“你可千万别乱发脾气，像你外祖父那样又厉害，又傲慢！到头来成了一个大傻瓜。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会宽恕任何人的！永别了，唉……”

她从松弛的褐色腮边擦去几滴稀稀拉拉的眼泪，说道：

“咱们再也不能见面啦，你这个不安分的孩子即将远行，我恐怕再也见不到你啦……”

我曾离开过她，但这一次离别让我感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苦痛——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世上如此真心爱我的人了。

我站在轮船船尾看见：她在码头岸边，一只手画着十字，另一只手抓着那条旧披肩的一角擦自己的脸和那双闪耀着无限慈爱的黑眼睛。

我来到了这座鞑靼式城市，住在一所孤零零地坐落一条狭窄街道尽头山冈上的房子里，房子的另一面墙对着一片荒芜的空地。空地里长满了杂草，一片砖房的空虚里有一口大地窖，这就是我的又一所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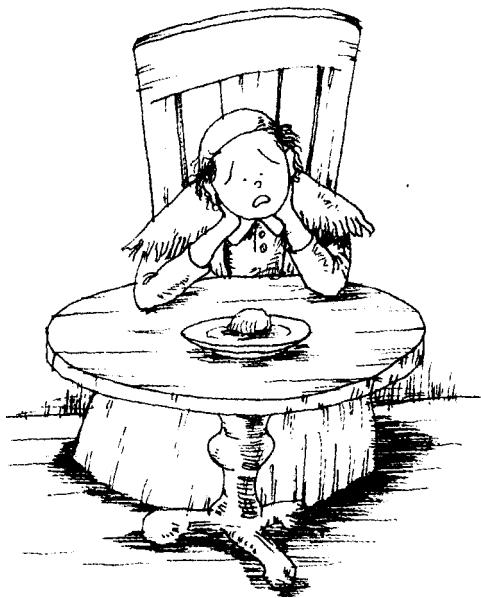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有母亲和两个儿子，靠极少的抚恤金生活。刚来的几天我就看到，这个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的寡妇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忧愁。她从市场回来，把买到的东西摆在厨房的桌子上，在她的面前有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用一小块肉去填饱三个壮小伙子呢？

我沉默无语。我看到她的灰色的眼睛里不仅透露着温顺，也还有一种顽强的精神在升腾……

三天后，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时，她的两个孩子却还在梦中，她问我：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

“学习呀，上大学。”我答道。



“啊，见鬼……”

她的刀碰破了手指，连忙吮了吮，又坐到椅子上，却又立刻站了起来，两条眉毛连同额上的黄皮肤往上扬着。

她用手帕缠上割破的手指，夸奖我说：

“您很会削土豆。”

哼，怎么能不会！于是我对她讲了我在轮船上干过的活儿。她挖苦道：

“你以为靠这个就能实现上大学的梦吗？”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幽默。我以一个孩子的心去对待她提出的每个问题，从未怀疑过，正是这一点最终让我走进了科学的大门。

她叹了口气喊道：

“哎，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候他正进厨房来洗脸，他睡眠惺忪、头发蓬

乱，像往常一样快活。

“妈妈，做顿饺子吃可以吗？”

“好吧。”母亲同意了。

我想显示一下自己烹饪方面的技艺，就说：要做饺子，就是这块肉不好，也不够。

这时她生气了，朝我喊了两句刺耳的话，随手把小胡萝卜往桌上一扔，甩手出了厨房。此时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尼古拉对我眨了眨眼：

“生气啦……”

他坐在板凳上告诉我，一般说来，女人比男人更易生气，她们天性如此，——这点已被一位有声望的学者证实了，他好像是瑞典人。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也讲过类似相同的话。

尼古拉很愿意帮助我，他利用每一个可利用的机会，教会我一些生活必不可少的知识。我认真地听他讲，后来佛克、拉罗主佛克和拉罗主查克林在我的记忆里混成了一个人，天会知道谁砍了谁的头。可有一点可以相信，这位年轻人真心帮我。他信心百倍地希望我成

长，却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的条件，来认认真真的帮助我。那种年轻时代的无知与幼稚让他看不到母亲的辛苦。他的弟弟是个不愿说话的中学生。比哥哥的表现更加无知。然而我对这一切的辛苦与苦痛早已看在眼里：母亲为了生活不忍心去骗孩子还加上我这个外来的可怜虫。生活上每一块面包都不易得到，于是，我只好为了省下一块面包去独自躲在空地上的大地窖里，那儿弥漫着死狗死猪的臭味。在狂风的怒吼中，我开始渐渐认识到了上大学对于我这个可怜虫只不过是梦。我想像自己是个魔法师，能变出各种可爱的形象，还有美味呢……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种种奇遇和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梦。在生活困难的日子里，这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这样的日子太多，——我也越来越喜欢幻想。我不期待外来的帮助，也不指望幸运的美丽，但是在我内心却逐渐培养了坚强的意志，生活条件越是困难——就觉得自己越需要坚强，甚至越需要聪明。我早就明白，人都是在痛苦中学会坚强的。

为了不挨饿，我经常去伏尔加河畔的码头。在那里很容易就能挣得 15 到 20 戈比。在装卸工、流浪汉、骗子中间，我觉得自己如同被扔进烧红的炭火中的一块铁——每天都会多一些痛苦的事情压在我的心灵深处。一些贪心鬼们每天都在我的面前转来转去，还有一些粗人和我一样承受着苦役，我同情这些可怜的人们也更理解他们生存的苦与乐。

巴什金曾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如今却成了一个穷得吃不上饭的可怜的病鬼，但他仍还会开导我。

“你怎么畏畏缩缩像个大姑娘，或许怕弄坏了名声吧？姑娘要个好名声——这是她的财产，可是对你来说不过是个枷锁。公牛名声好，因为它吃的是干草！”

巴什金长着棕色的头发，胡子留着长长的八字须，身材矮矮的，行动倒不笨，活像一只可爱的小花猫。他对我既像老师和长辈，又像保护人，我看得出来，他真心希望我获得成功和幸福。他非常聪明，读过不少好书，最喜爱《基督山伯爵》。

“这本书里有目标，也有感情。”他说。

他喜欢女人，谈起她们来便津津有味地咂嘴，带着激情，那衰弱的身子发出一阵阵颤抖，在这种颤抖中有不正常的一种反应，让我恶心，但是我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觉得这些话美妙动听。

“婆娘，婆娘！”他喊着，脸上的黄皮肤染上了红晕，黑眼睛里闪现着赞赏的神色，“为婆娘——我什么都愿干。婆娘就像魔鬼——无罪过可言！活着就要爱，再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了。”



他是个天生的讲故事能手，能轻易地为妓女们编一些动人的小曲，讲述不幸的爱情故事——他的曲子在伏尔加河沿岸所有城市传唱着，顺便说一句——下面这首流传很广的歌曲就是他作的：

我贫穷，又不漂亮，穿的也是破衣裳，

女人！女人！

因为这样谁也不肯要我这种姑娘……

行迹让人怀疑的人特鲁索夫对我也挺好。他衣着向来都是那么整洁，而且长相很有绅士风度，尤其他那双音乐家一样修长的手指，更令人倾倒。他在城郊船厂区开了一家小铺子，挂着“钟表匠”的招牌，却私卖脏物。

“马克西姆，你可别学偷窃这玩意儿！”他眯缝着狡黠的、胆大妄为的眼睛，神气十足地把着花白胡子，对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得走另一条路，你是个崇尚精神的人。”

“崇尚精神——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嘛，就是说，对什么都不嫉妒，只有好奇……”

这么说我并不正确，我嫉妒过许多人和许多事；比如说，我就嫉妒过巴什金，他有一种特殊本领，能用类似读诗的声调讲话，还加上种种料想不到的譬喻和表达方法。我记得他讲一次恋爱奇遇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

“漆黑的夜里，我像猫头鹰钻树洞一般，坐在贫穷的城市斯维亚什斯克一家旅店的房间里。正值秋天的十月，阴雨连绵，秋风萧瑟，风儿像一个受委屈的鞑靼人拖长声调唱一支歌，歌儿无尽无休：呜—呜—呜—呜—呜—呜—呜—于是她就来了，又轻盈，又天真，犹如太阳东升时的云霞。一双眼睛里——流露出假的心灵纯真。‘亲爱的，’她用真诚的声调说，‘我没对不起你。’我知道她在撒谎，但是相信——这是真的！凭头脸——我清楚明白；凭感情——我绝不相信！”

他一边讲，一边有节奏地晃动身子，半闭着眼睛，

而且用轻轻的动作拍打着自己胸部的心口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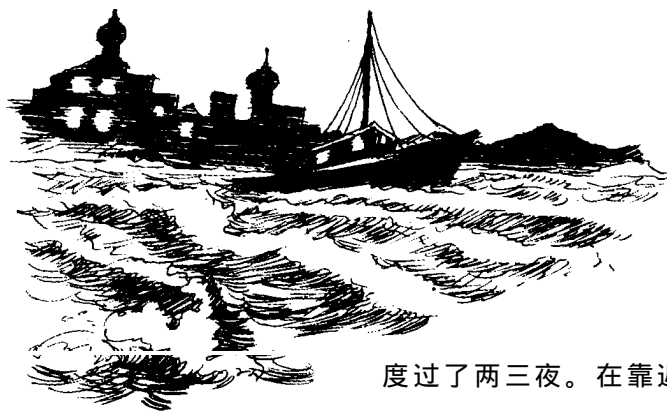
他的声音又低沉又平淡，可是语言鲜明，有点像夜莺歌唱。

我也嫉妒过特鲁索夫——此人讲起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则津津乐道，谈到东正教高级僧侣的生活却存心嘲弄，恶言相加，有一次他竟神秘地讲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是自己事业的行家！”

我觉得特鲁索夫好像是那样一种“恶人”这种人在小说结尾往往令人感到出乎意料——竟会变成舍己为人的英雄。

有时候，在闷热的夜里，这些人渡过喀山河，到草原上，走进树丛，在那儿吃吃喝喝，谈论自己的各种事情。而经常谈起的是生活的错综复杂和人际关系的混乱不堪，谈特别多的是女人。谈起这些事，便心怀愤恨与忧伤，有时又很感人，几乎总有一种感觉，仿佛在窥探那充满种种可怕意外的暗处。在群星黯淡的夜空下、在长满茂密花柳树丛的闷热的洼地上，我同他们一起



度过了两三夜。在靠近伏尔加河的潮湿的昏暗中，桅杆上的点点灯火像金蜘蛛似的，向四面八方爬动。在岩石岸边那片漆黑中，夹杂着一团团火光和一条条光带——这是富裕的乌斯伦村的酒馆和住房的窗子发出的灯光。轮船的轮片闷声地拍打水面，驳船船队的水手们像狼似的拼命嚎叫，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打铁，凄凉地拖长声音唱着一支歌——什么人的心在悄悄燃烧，歌声在心头蒙上一层淡淡的哀愁。

而静听人们脱口而出的那些话更加令人忧愁，——人们开始思考生活，每个人只管讲自己，几乎不听别人说话。他们在树丛中、或坐或躺，吸着香烟，并不贪婪地偶尔喝点伏特加和啤酒，沿着回忆的路线，返回

到什么地方。

“我碰到过一件事……”在漆黑的夜色中，有人趴在地上说。

人们听完这段故事，表示赞同。

“常有这种事，经常有……”

“有过”，“常有”，“过去常有”——我听着，似乎觉得今夜人们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什么都有过了，再也不会有什么了！

这使得我和巴什金、特鲁索夫疏远了，但是我终究喜欢他们。按照我的经历，如果我跟他们走，那也是完全自然的。想往上爬和上大学的愿望遭受严重挫折，这也促使我去接近他们的一个原因。在饥饿、愤恨和愁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犯罪，不仅仅是反对“神圣的私有制”。但是青年人的浪漫精神妨碍着我从命中注定要走的那条路上转回来。除了人道主义的勃荣特·哈特的作品和一些庸俗的小说外，我已经读过不少严肃的作品，这些书在我心中唤起某种追求的愿望，追求什么我不明确，但比我所见到的一切都更有意义。

就在这时候，我结识了新伙伴，有了新的感受。在叶夫列伊诺夫家附近的空地上，常聚集着一些中学生，玩积木游戏。我很喜欢他们当中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他肤色黝黑，满头黑发，像日本人，脸上长满雀斑，好像涂上了火药似的。他永远是乐天派。游戏玩得利索，谈吐机智，真是饱含着各种天才的素质。几乎同所有天才的俄罗斯人一样，他靠着天赋过日子，并不想加以增强和发展。他对音乐有细腻的听觉和出色的欣赏力，热爱音乐，可以像艺人那样演奏古斯里琴、巴拉莱卡琴、手风琴，但他并不想掌握更高雅、更难演奏的乐器。他贫穷，衣着很差，但是那件皱巴巴的破衬衫、那条满是补钉的裤子和穿得破窟窿的皮靴，却很适合他的剽悍气质、精瘦身材的敏捷动作和豪放的姿势。

他很像长期重病之后刚站起来的病人，或者像昨天才从牢狱释放的囚徒，——对他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愉快的。一切都在他心中唤起无穷的欢乐，——他像花炮似的，在地上跳来跳去。

他得知我生活困难而且有危险，便提出让我搬过

去与他同住，并准备报考乡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那个奇怪的、热闹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大概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都熟悉这个地方。这是鱼市街上的一所破旧的大房子，仿佛是那些忍饥挨饿的大学生、妓女以及一些无用人的幽灵，从房产主手里夺来的。普列特尼奥夫住在通往阁楼的楼梯下边的走廊上，那里放着他的单人床，走廊尽头靠窗口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别的了。三个房门对着走廊，两个房间里住着妓女，第三个房间住的是一个患肺病的师范学校数学系的学生。他又高又瘦，让人见了害怕，满脸是红褐色的硬毛发，一身肮脏的破衣服勉强能够遮体；从破衣服上那些窟窿里，令人厌恶地露出发育的皮肤和精瘦的肋骨。

他似乎只吃自己的指甲，把指甲啃得出血，白天黑夜都绘制和计算什么，并且咳嗽不停，发出低沉震耳的声音。妓女们怕他，把他当作疯子，但是出于怜悯，还是把面包、茶叶和沙糖偷偷放到他门前，他从地板上拣起这些包裹，带回自己屋里，呼哈呼哈喘着粗气，像



一匹累坏的马。如果她们忘记了，或者不知何故没能给他送去这些礼物，他便打开房门，冲着走廊嘶哑地喊叫：

“面包！”

在他那双藏在深邃的眼睛里，闪烁一种由于意识到自身尊严而感到幸福的躁狂者的傲气。有时有个矮小的驼背的残废人，拖着一条扭伤的腿前来找他，这人鼓囊囊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满头花白头发，那阉割派教徒的黄脸上露出奸笑。他们关紧房门，在出奇的寂静中，一连几个小时默默地坐在那里。只有一次，深夜时分，数学系学生嘶哑的怒吼，把我吵醒了：

“我得说——简直是牢房！几何学——是笼子！是

的！是陷阱，是的！牢房！”

驼背的残废人尖声嘿嘿笑着，多次重复一些奇怪的字眼，学数学的学生突然狂吼起来：

“见鬼去吧！滚！”

这时他的客人匆匆进入走廊，嘴里嘟嘟囔囔尖叫几声，全身裹在那件宽大的斗篷里。这位数学系学生站在门槛上，身材细长，样子可怕，手指插进凌乱的头发里，嘶哑地喊叫：

“欧基里德——是个傻瓜！我要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声音很大，震得他房间里什么东西“轰隆”一声掉下来了。

我很快得知，这个人想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在完成这项课题之前，他就死了。

普列特尼奥夫在印刷厂里干报纸的夜班校对，一夜能挣 11 个戈比，如果我挣不到工钱，我们过日子一昼夜得要四俄磅面包、两戈比茶叶和三戈比砂糖。然而，我没有时间干活——要去学习。我用尽艰辛攻克各